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伦理化的尝试

马建青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文明与历史变得岌岌可危的 20 世纪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征了人与历史相断裂进而历史成为人的异化力量这一重要现象。于是,如何跨越横亘于人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便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他们看来,客观主义的历史编撰学和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都将人的责任从历史中抽离出去进而否定了人的历史和历史性。由此,他们主张将历史伦理化,即通过个体的道德责任将人与历史统一起来。一方面,他们在现代的偶然性境况中和人性的深处寻找历史伦理化的可能条件;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将个体责任本体论化,进而在存在层面和历史层面将责任全面引入历史,以期将历史还给人自身。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将历史伦理化的尝试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但这种努力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弥足珍贵的。

关键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责任;道德;伦理

作者简介:马建青(1982—),男,山西和顺人,哲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7CZX00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菲伏尔城市现代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BZX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5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9)02-0001-07 收稿日期: 2019-01-08

DOI: 10.19563/j.cnki.sdzs.2019.02.001

历史是人的力量的外化和展开,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和产物。人与历史在本然的意义上是统一的,换言之,人就是历史,历史也是人的历史。但历史一旦外化出来,便有可能转化为一种与人相独立的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会变为消灭人的力量。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在特定条件下会成为一种与人相异化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历史内在具有的统一关系断裂了。无疑,文明与历史变得岌岌可危的 20 世纪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征了人与历史相断裂这一现象。于是,如何跨越横亘于人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便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基本问题之一。从逻辑上

讲,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重构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方式的着力点在历史之上,将历史实体化为某种超级主体,通过这种超级主体的能动性打通二者。第二种方式的着力点在人之上,将人的能动性激发出来,通过人自身的能动性来架通二者。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那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①则采取了第

^①事实上,并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每个人都对此问题单独有所论述,但他们提出的思想整体便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层面对历史做一新的思考和阐释。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更有针对性,我们主要从对之有直接论述的思想家那里获取灵感。从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不难窥见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

二种方式来对抗和纠正第一种方式。换言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用人道主义范式重新审视历史的过程中将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拯救人的历史性的强大力量凸显出来,并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点将外在于人的历史转化为根植于人的道德责任的历史,以便将历史归还给人自身。这一历史理解围绕着人的实践活动,并且引入伦理和价值尺度,试图通过个人的道德责任来恢复人与历史的统一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将历史伦理化的把握历史的方式。这种将历史伦理化的尝试和努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并将一种并非全新但极富见地的人道主义观念传递给世界。透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我们不仅可以经验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神世界的焦虑与渴望,从而更深入地把握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也可以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节律中倾听整个世界对人类良知的呼唤。

一、没有历史的历史观批判

20 世纪的历史灾难在文化层面表现为文化危机,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而传统的历史哲学对文化危机的发生难辞其咎,因为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西方文化基调的奠定。对此,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赫勒指出“对现代性进行合法化的哲学在极权主义国家的灭绝集中营里得到了实现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实际发生的情况”。^{[1]18}科拉科夫斯基将这种历史哲学所发生的功能称为“形而上学的恐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真正要追问的是:传统历史哲学的问题何在?一种在逻辑层面自洽的历史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导向理论的自我否定以及对历史的否定?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近代史学之父兰克所主张的“如实直书”的历史编撰学存在的问题在于,将人及其价值选择排除在历史之外。正如 20 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所表明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无成见的,完全客观的。问题的提出以及理论的创立皆是一定的“前结构”介入的结果。同样,历史的书写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价值导向。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柯林伍德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证明,历史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但历史书写又不可能是完全主观的,它以一种主观的方式言说了客观的内容。质言之,历史书写

存在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张力之中。与这种见解相一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历史书写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客观的,而始终是与当代人的价值选择关联在一起的。赫勒直言道“没有一系列价值的应用,历史质料就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2]100}在她看来,一种好的理论不在于它描述了更多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它包含了更多来自过去的意义。沙夫在批判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指出,历史应该不断地被重新书写,因为,历史认识既涉及客观要素,也涉及主观要素,二者统一于人的历史性活动之中。但是,在历史编撰学那里,过去是一个已然过去并独立于当下的认知对象。如果过去只是一个需要加以描述和揭示的对象,那么历史书写便不需要任何的价值介入。如此一来,历史成为一个外在于在世之人的“物自体”,它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意义效果便被切断了。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尽管历史学家客观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可能是个“坏”故事。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可以被免除。如果考虑到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以及共同历史的作者,那么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道德责任可以被免除。而当每个人无须承担起道德责任之时,历史也就不成其为表达人的历史性的历史。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从整个哲学史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古希腊时期,尽管易朽的历史从属于永恒的自然,但历史以及人自有其荣光。因而,西罗多德做的工作便是要保存那些荣光。古希腊的悲剧便是要赞扬人的荣光。即使在中世纪,上帝的存在也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或通过赎罪的方式肯定了人的在世性。但是,到了 16 和 17 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物理学的发展,思想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自然科学的色彩。由于自然科学强调的是那些可以重复、可以量化的经验,因而转向了专注于过程的实验。由此对“事物的兴趣转向了对过程的兴趣”,而事物几乎迅即成了偶然的副产品。^{[3]53}在此影响下,思辨的历史哲学终将“过程”本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人以及人的活动最终被视为某存在物或某种功能。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历史乃是人的历史,因而是人的各种活动、活动方式及其活动产物表现的领地。而人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不断

地开出各种可能性,因而历史必然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历史,因而也是充满着可能性的历史。在他们眼中,思辨的历史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性的宏大叙事。这种抬高理性而贬低人性的哲学的灾难性后果便是历史的绝对主体剥夺了人的道德属性,卸除了人的道德责任。科拉科夫斯基将此问题形象地描述为“造物主的鸦片”。在他看来,如果历史不可避免地朝向终极目的,那么人们便可用“对世界精神的秘密的认识”“推导出人类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4] 252-253},并按照这种标准来行动。这里存在的危险在于,历史中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是道德的,正如在终极目的的帮助下,法西斯主义的暴行都可能被道德化,因为在历史哲学家所设想的有始有终的历史进程内,每个事件或阶段都可以被任意解释。赫勒将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称为目的论的历史观,并从历史性的角度揭示了它的非历史性。在赫勒看来,“在历史哲学中,历史的真理在未来中揭示自身:在历史或历史性或二者兼有的未来中揭示自身”^{[2] 223}。思辨的历史哲学总是从未来的角度来回溯过去和当下,换言之,它设定“应该”并通过“应该”推出“是”。历史哲学尽管声称解释了历史,但最终解释的只是他们设定出来的那个“应该”,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因此,“历史哲学从非历史的观点历史地反思历史存在”^{[2] 270}。同时,历史哲学尽管给出了一个“应该”的标准,却不是真正地属于个人的标准,因为这里存在着“最高价值(自由)和相同价值(与其他相关价值的)本体论化之间的矛盾”^{[2] 271},即绝对者的自由恰恰消解了个体的自由。与前二者的观点大同小异,马尔科维奇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乃是一种基于本质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他看来,这种理论形态无论是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如牛顿的绝对时间观)还是在主体性的意义上(如康德的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时间观)都将时间交付给某个超验之物,从而将时间封闭在实体之中。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表现为被某种超验本质所决定的历史,而非历史性展开的历史。马尔科维奇对此指出“任何直接把握总体性而又没有分析中介的尝试,都会导致神话和意识形态。”^{[5] 8}在他眼中,总体性的呈现总需人的实践这个中介在场。

这种批判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般表现。在那个艰难而又严峻的时代,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追问一个声称文明的社会何以会产生如此之多的恐怖之事。无疑,传统的历史哲学对于这种文

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传统历史哲学是需要批判的。但是,将文明危机的根由完全地归结到支撑传统历史哲学的理性之上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滥用。正如康德的批判哲学试图给理性划定界线一般,他们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为理性划界,以期将理性拉入正轨。因此,他们都对传统的历史哲学持保留态度。科拉科夫斯基指出,无论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多么地有问题,但仍然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即它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赫勒用“不合时宜”表达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不足,并肯定了这种宏大叙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生活的激励功能。马尔科维奇所主张的历史的辩证决定论无疑也继承了本质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要素。

二、历史伦理化的条件

历史是人的历史,因而人理所应当为历史负责。为历史负责也就是为人自己负责。当我们和历史打交道的时候也就潜在地表明责任的在场。无论是对历史做一本质主义的考察,还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做一根本性的反思,都表达了人对于历史的兴趣、敬畏和期待。但是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尚未达到反思的责任意识还不足以让我们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在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人们似乎从来都不缺乏自发的责任意识,但这并不妨碍历史走向人的对立面并成为压制人的力量。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责任引入历史是可能的,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这种自发的责任可能转变为自觉的责任。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意到现代性状况为个体责任的行使提供了客观条件。赫勒通过对现代性状况的考察,揭示了人的偶然性境遇。在她看来,前现代世界中的人们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决定的。在那里,个人的生命和活动完全受制于血缘、种族、家族、地位、身份、职业等无名力量。因而,个体是什么样的不在于他怎么做,而在于支配他的外在力量是什么。一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决定了是什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自由选择是无从谈起的,遑论责任的行使。现代性固然产生了冲突、斗争、战争,甚至灾难这样的后果,但它也将个体从支配并决定他们命运的力量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摧毁了一切

坚固的东西,在物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的独立性。个人的解放也意味着将个人交付给了“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不仅是先天的本体论事实,而且是后天的经验论事实。换言之,并没有什么先天的条件决定了你出生在何时何地,也没有什么后天的条件决定你该如何选择、决定和行动。对此,赫勒形象地说道:“前现代人就像信一样被随意扔进一个信箱之中,在那里所有的信被扔进同一个信箱,写着相似的地址——他们被设想到达命运的相同位置……现代的人也被随意扔进不同信箱中的信相似,但是没有地址被写到他们身上:他们没有目的地。可以这么讲,这些信需要它们自己去确认它们自己的目的地。它们成为它们自己的派送员。”^{[6]31} 鲍曼将现代性描述为“流动的现性”。在这个固定规范、绝对价值、确定原则皆如液体般流动的时代,“那些过去常被认为是由人类集体性天赋和财富的人类理性来完成的工作,已经被打碎了(个人化了),被分派给了个体的勇气和力量,听任于个人的管理和个人性的控制谋略”^{[7]44}。在此意义上,偶然性已然是现代男男女女必须接受并生存于其中的根本境遇,而且终将迫使人们回到自身并通过自身来做出选择,寻求确定性,而不是盲目地抓住某种外在的确定性并接受它的统治。既然要做出自由选择,那也就意味着必须担负起责任。基于对现代性状况的这种判断,他们像存在主义者一样认为,人必须做出自由选择,并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如果责任之行使只是由外在力量推动的,那么这种责任还构不成自觉的责任。于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回到人性的深处来寻找责任的本体论根基。虽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从根本上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挣扎于物性与神性、自然和历史、有限和无限之间。这就是人的宿命。但这并没有将人固定成一个僵死之物,因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46},人总是要渴望超越诸种限制,而试图企及无限性和统一性。而且,人确实能够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这一目标。正是在人的自由活动中,一切可能性向人自身敞开。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眼中,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构成了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明确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从事自由

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9]18} 马尔库什以相同的口吻讲道:“人的首要特性,即人的‘真正的本质’,就呈现在人创造和形成自身的主体性的自我行动中。”^{[10]69-70} 赫勒将个性的生成看作是个人的创造性能力的现实表达,因为“个性代表了最大限度地分沾了类本质可能性的个人的潜在可能性”^{[11]16}。无论如何,人不是任何诸如上帝这样的他者的造物,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任何他者的手中,而就在自己的手中。人就是人的主人,个人便是个人的主人。如此,人便应该而且必须遵从发自人性深处的召唤,自由选择,自我决定,自我实现,自我负责。换言之,只要人作为个人而存在,自由和责任便是不可避免在场的。尽管在现实中,自由往往会表现为不自由和逃避自由,责任往往表现为不负责任和逃避责任,但在他们看来,即使在这些场合中,自由和责任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遮蔽了。

显然,相比于责任得以可能的现代性条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重视责任得以可能的人道主义根基。毕竟,外在条件总是经验的,是无法完全掌控的,甚至它仍然是被决定的。事实上,他们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现代性进程所创造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境遇仍要受制于某种结构性的力量。马克思当年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揭示了在个体的经济活动背后存在着强大的资本逻辑。20 世纪的现代性文化在事实上表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但“碎片化”是否只是某种结构表现出来的幻象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显然,古老的资本逻辑改头换面又来到了“个人化”了的个体面前,并通过“理性的狡计”来支配每个个体。相反,人道主义根基是内生的、先验的,因而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被自己完全掌控的。正因如此,他们反复强调个体、自由、责任的绝对优先性,并试图通过人道主义的努力将现代性从一开始便加以追求的自由理念从宏大叙事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从而使自由成为一项事关个人生命成就的事业。

三、历史伦理化的构建

将历史伦理化并非易事。在思想史上,思辨的历史哲学倾向于将历史整体化、实体化,进而伦理化。这一点既表现在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命题中,也反映在基督教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如果将历史理解为人的历史,那么历史伦理化的

关键就不是在历史之外寻求某种伦理化的实体,而是向历史的深处或人性的深处寻求某种道德力量。总体来看,那些执着于现代性伦理重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致力于唤醒人性中沉睡的道德力量。

在本体论层面,个体的责任具有绝对优先性。责任的绝对性意味着,它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良知之中的,而不是由外在力量强加于上的。科拉科夫斯基希望通过调动起“自我保存的动力”(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道德力量)来对抗“禁忌的消失”。在他看来,世界是先在地给予我们的,我们一生下来便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整体。一旦我们接受了它,我们便需要负起责任来改造它,保管好它。因此,责任始终是和我们的行为在一起的。同样,“道德的本体论地位是鲍曼和赫勒重建现代道德的理论预设”^[12]。赫勒在对人的偶然性境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个体而言,责任是‘内在的’——不仅是责任而且是责任的接受……个体则把‘命运’视为自己的命运。”^{[11]23}在鲍曼那里,道德责任并非教化之物,而是植根于人的道德本性或道德冲动。“‘承担责任’与其说是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的结果,不如说它构建了萌生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的原初场景,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以此为参照,试图重新框定和管理它。”^{[13]序言1}责任的绝对性也意味着,它需要无条件地被履行,尽管后果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赫勒隐喻性地将选择描述为一场赌博,结局可能是胜利,也可能是失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下注,无一例外。对此,鲍曼明确指出“道德责任是无条件的和无限的,它在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不断痛苦中证明了自己。道德责任从来不为其存在寻找保证,也从来不为其不存在寻找借口。道德责任存在于任何保证和证据之前,存在于任何借口或赦免之后。”^{[14]295}这样一种观点可以在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中找到根据。

在存在层面,责任之行使表现为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便是在不确定性中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任何机构、普遍规范、一般规则或强力的权威,通过自己的行动选择自己的命运。在最直接的方面,选择自己的命运意味着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的后果负责。一个人依照匿名历史的指令而犯下罪行,要承担道德责任;一个士兵听从军官的命令犯下罪行,也要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只

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对各种恶的行为做出审判。在总体性的层面上,选择自己的命运意味着积极肯定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并看护好生命的一切。在此意义上,个人应该倾听道德命令的召唤,并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律的方式实现作为道德存在的个体所内含的全部生命内容。赫勒将这种责任伦理学称为“好人伦理学”。在她那里,好人就是绝对的乌托邦,是个体应该选择并趋于的理想形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负责就是成为一个好人,过一种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尽管每个个体是“准单子”(赫勒语)式的独特存在,但他/她也是主体间性的存在,个体必然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构建自身的。也就是说,我与他人始终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我的世界,也是他人的世界;既是差异的世界,也是共同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分享一个世界,我们就不能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世界。”^{[6]317}显然,对他人负责便是对我们自己的世界负责,因而也是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是对自己负责的应有之义。赫勒所讲的好人意味着对“他人召唤和诉求”做出“应答”。深受列维纳斯的他人伦理学影响的鲍曼将他人之面容视为责任行使的动力。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他者的软弱性才使我承担起责任,也正是由于他者的强大才使我被强制履行义务”^{[4]366}。科拉科夫斯基将个体责任视为社会需求的表现。

在历史层面,责任表现为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责任。如前所述,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历史编撰学强调过去,忽视了当下和未来;思辨的历史哲学强调未来,忽视了当下和过去。这两种历史理论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将当下悬置在一旁从而割断了当下与过去、未来的统一性关系。如果当下缺席,个体现实的责任也就无法出场。如果个体当下的责任缺席,过去和未来便成了无人身的历史,历史便更有可能成为与人相异化的敌对力量。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死去的人负责,也不能指望未到的人负责,只能指望活着的人负责。基于此,他们更加强调当下,试图以此来联结起过去和未来。也就是说,当下人们的活动既表现为回溯性地对过去的建构或重新书写,也表现为前瞻性地对可能的更好未来的期许和付出。在赫勒那里,“现在是绝对的现在”^{[1]20},是人们必须加以接受的共同性,是只能依据并通过自身来证明自身正当性的当下,是我们必须行使责任并赋予意义的世界。依照绝对的现在,赫勒将过去看作是

当下之人通过一系列价值、规范和理念而使之在当下复活并向之学习的对象,将未来看作是当下之人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选择而使之在当下显现并向之趋近的理念。可以说,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过去和未来不再单纯是主体可拉开距离进行描述和认识的外在对象,而从根本上已经融入个体的当下选择中。过去在实然的层面上是什么和未来在应然的层面上是什么都取决于当下的人们如何选择,如何“书写”。在此意义上,过去并未过去,未来并非未到,它们皆显现在当下。

四、历史伦理化的困境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伦理化的尝试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伦理学建构中发现诸多困难。有些困难是他们不自觉的,而有些困难是他们有所自觉的。不管怎样,指出这些困难有助于我们看清其思想的限度。

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肯定人是一种道德存在,并将此作为其伦理学构建的基本前提。但人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道德存在仍值得我们思考。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道德律是天赋的、内生的、绝对的,它作为“绝对命令”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效的。像马克思之类的思想家则认为,道德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社会存在的表达和反映,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显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与康德的伦理学更为相似,都强调道德的先验性。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直观到道德现象进而通过反思揭示道德律存在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天然地就是道德存在。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所谓的道德只是一种虚假意识,如同宗教一般。即使我们接受了先验道德这样的观点,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致命追问:先验道德源于何处。在这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未能给予说明。作为无神论者的科拉科夫斯基从未打算把道德建立在任何超验的基础之上。他最后把道德建立在“直观知识”的基础之上。赫勒也未详细地论证他所讲的“好人”在什么意义上是普遍存在的。在他看来,有“好人”存在着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好人”是值得人们追求的绝对乌托邦。鲍曼则将道德追溯至人的道德冲动。诸如此类的解决方式和康德将道德建立在上帝的做法并没有根本区别。它们都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悬置了。这里始终存在着走向独断论的嫌疑。尽管我们这里的质疑在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是本质主义的(总是要追根溯源),但无法否认的是,建立在未经批判的理论前提基础之上的理论终究是不牢靠的,通过直觉来保证理论的实践效力终究是成问题的。

退一步来讲,即使我们普遍承认人天然地具有“良知良能”,但这种“良知良能”在多大程度上可开出一一种更好的未来也是存疑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的考察应该回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如果脱离这些外在的客观条件,我们也就很难把握道德意识的本质以及道德行为的现实根据,进而也就无法为人的未来寻出一条现实之路。固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讲的道德来源于对现代性状况的考察,指向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具体选择和责任,但他们对于个人如何做出判断、如何做出选择、如何承担起责任的讲法还是更多地停留在呼吁层面。比如,在赫勒那里,做出判断依靠一种讳莫如深的“实践智慧”,做出选择需要一套从“绝对精神”到个体生命体验的价值,承担责任靠的是绝对命令的绝对要求。事实是,道德选择的做出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虽然可以凸显此事情的重要性和上手性,但也把此事情的革命维度遮蔽了。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尽管批判传统的哲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痕迹。因为这种道德仍停留于个体的“应然”层面,所以它的力量很难在现实中充分地发挥出来。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哲学时就曾明确指出“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15]240}事实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意识到了单纯依靠个体责任所带来的困境。他们在很多场合将个体的选择视为不得不做出的赌博。赫勒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伦理学称为“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2]341}。正因为道德和伦理的脆弱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通过个体的道德行为将人与历史统一起来或将历史归还给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成功的。人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只是被缩小了。

同时,应该看到,对个体道德责任的过度强调有可能会导向历史虚无主义。尽管历史是人的历史,内含着人的目的,但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发挥能动性。显然,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看重的是个体的道德选择,而不是历史的规律。如果将历史托付给个体的能动性,那么历史的客观维度便容易被遮蔽。换言之,如果历史主要表现为个人的历史,那么历史便容易被虚无化。实际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里存在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试图将个体的能动性和历史的客观性协调起来。沙夫既强调历史真理的主观性,也强调历史真理的客观性。科拉科夫斯基论证了社会决定论和道德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进而肯定了个体责任与社会需求是统一的。赫勒试图将重新理解的绝对精神引入她的个性伦理学体系中。鲍曼在晚年提出了一种人类道德生活的双重辩证法,试图将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统一在一起。即使如此,不得不承认,在他们的伦理学体系中,个体的道德选择始终是优先于客观历史的。历史的客观内容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历史的客观性是个体道德性的表现。对道德责任的过度坚守在逻辑上会导向对客观历史的消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赫勒的“真理是主观的”^①这一可导向多种解读的判断中窥见一斑。

尽管如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后人值得反

复研读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实证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做斗争,揭示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再现了人的辩证法。它在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中汲取资源,并将它们汇通成一股清新的思想潮流,为人们考察历史提供了种种启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列维纳斯的他人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等多有相通之处,共同表达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道德呼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诉求。它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事件和政治生活的积极介入中深有体现,表现了一个艰难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为晦暗的历史地平线燃起一丝亮光。

①参见:阿格妮丝·赫勒.碎片化的历史哲学[M].赵海峰,高来源,范为,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第4章。在这里,赫勒用“真理是全体”和“真理是主观的”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来规定真理的内涵。在她看来,真理并非关于绝对的绝对知识,而只能是生存论意义上生命的在世绽现,即在个体存在的选择中绽现出来的全部。尽管赫勒多次强调“真理是主观的”这一命题与真理的相对性无关,但它极易导向相对主义真理观,从而使历史以及历史真理虚无化。

参考文献

- [1]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M].李西祥,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3]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4]亚当·沙夫,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哲学与现代性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义文集[C].衣俊卿,编.郑莉,张笑夷,马建青,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5]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C].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6]阿格妮丝·赫勒.碎片化的历史哲学[M].赵海峰,高来源,范为,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C].郑一明,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10]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李斌玉,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11]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12]张笑夷.流动的道德与绝对的责任——鲍曼和赫勒论现代道德重建的可能性[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 [13]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 [14]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赵强]

The Attempts for the Ethicization of History by Neo-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

MA Jian-qing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were precarious , the discontinuity between people and history arrived at an extreme where history became the alienating force against people. Hence how to bridge the chasm between people and history has been one of the cardinal issues pondered by the Neo-Marxism theoreticians in Eastern Europ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 both the objectiv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abstract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issoci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eople from history and further to deny th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 nature of people , by which they claim to ethicize history , in other words , to unify people and history through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individuals. On one hand , they seek for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the ethicization of history from modern occasional situations and deep inside human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 they introduce responsibility into history in an all-round way from the aspects of existence and history through ontological rendering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with a view to returning history to people themselves. It is hard to gauge that the attempts of ethicizing history by the Neo-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 is a complete success , but the humanitarianism demonstrated by the attempts is ever more valuable.

Key words: Neo-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 history; responsibility; morality; ethic

The Legislative Choice of Membership Recogni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GAO Fei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legislation on the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lagging behind social practice , the criteria for the membership currently established through local legislation , documents of people's court and village regulations have given rise to the dilemma of low-level normative effectiveness , the lack of basis for criteria development , high degree of community autonomy , the deficiency of strong restrictions and the non-unified standards short of basic consensus. The main causes behind the dilemma are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function of collective assets , the confus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nature of community autonomy and the invisible notion of fairness in benefit distribution. To cope with this phenomenon ,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criteria for gaining and losing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rough balancing the concepts of coercion and autonomy and by the principl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upplemented by basic survival guarantee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recognition standar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sic survival guarantee

The Basis and Nature of Urban Rights

XU Xiao-liang

Abstract: Urban rights fall under a special category of rights , which imply "the rights to the urban" rather than the rights in the urba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ghts to the urban" and "the rights to nature" lies in that urban society forms "a controllable space" , while nature shapes disperse spaces. In that urban space , urban rights stress communion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functioning of rights. Urban rights are a type of meta-rights , the common precondition to gain urban qualifications and exercise urban business. The nature of urban rights is a type of collective rights for the public to construct , renew and gain their rights to urban life , which is an appeal , a yell , especially , an action.

Key words: urban rights; rights to nature; meta-rights; collective rights